

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之尊严观的反思与重构

石 晶^{*}

内容提要：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预防立场取决于相应的价值观念。自由尊严观坚持尊严自主论，强调自尊和自主决定，相应的科技风险预防立场为弱式风险预防。秩序尊严观包括主客二分论、自然中心论、人性中心论，相应的科技风险预防立场为强式风险预防。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存在论证疏漏和内涵空洞等理论弊端。与之相应的弱式风险预防指向不明，强式风险预防缺乏理性，二者在指引国家公权力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时均会产生实践危害。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应当被重构为包含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四个维度的正义尊严观。正义尊严观涵括的风险预防立场为充分风险预防，充分风险预防较其他预防立场更具有优势。

关键词：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 自由尊严观 秩序尊严观 正义尊严观 充分风险预防

一、问题的提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遵循

科技发展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人体基因科技甚至影响了生命形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回应科技风险尤为必要。然而，风险预防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多种版本，^{〔1〕} 即便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也蕴含多种价值理念。风险预防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不同的预防立场，国家预防行为的立场选择同样遵循此种认识论规律。价值立场的选择体现了国家对于人体基因科技发展和风险预防的价值偏好，表明了国家意志，进而，国家通过立法等行为体现国家意志。然而，国家的权力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样的法律是正确的法律，国家权威的正当性无法建立在权力之

^{*} 石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1〕 See Richard B. Stewar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20 *Research in Law & Economics*, 74-76 (2002).

上，人性尊严是国家权力伦理的正当性根据，或者说，人性尊严在本质上是法的原则，并且，人性尊严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能够从公民文化中找到依据。^{〔2〕}可见，人性尊严是国家意志的核心关照。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对人性尊严构成了威胁，这必然要求风险预防将人性尊严作为核心要义。因此，尊严观念是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价值依据和内在理由。这种将风险预防与尊严观念进行本体与价值勾连的观点属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而尊严属于一个诠释性概念，具有可争议性，不同主体对尊严存在不同的解释性观念。^{〔3〕}这意味着无法对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进行单一解读，需要对不同尊严观及其涵括的不同风险预防强度进行拆分式解读。多向度的尊严观念阐释有助于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立场选择提供价值依据。

从学界关于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研究现状看，法学研究者更多地从风险规制措施的制度层面建构国家预防科技风险的法治路径，^{〔4〕}哲学研究者更倾向于从伦理原则、^{〔5〕}伦理界限^{〔6〕}和“帕累托改善”^{〔7〕}等道德哲学角度分析现代科技的价值选择问题。鲜有学者从尊严内置论的角度阐释风险预防的价值立场。既有研究仅将人性尊严作为风险预防的外在影响因素，并未对风险预防进行充分的价值解读，也未提出明确的风险预防立场。这会导致风险预防原则的价值指引不明确，无法一以贯之地将特定尊严观念落实到国家风险预防的制度构建中。本文将运用法学与哲学交叉研究方法，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视角探讨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价值遵循和立场选择问题。本文研究的问题聚焦于，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尊严观念作为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价值基础。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价值立场的选择决定了风险预防应当达到何种程度。

二、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

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无法脱离自由尊严观。自由尊严观坚持以自尊为核心的人的尊严，且自尊与自主决定密不可分，德沃金主张的伦理个人主义的尊严自主论便属于自由尊严观。自由尊严观对于人体基因科技秉持着全面支持的态度，此种自由伦理观的价值立场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研究和应用缺乏必要限制。

（一）尊严自主论的自由尊严观

尊严自主论体现为人性尊严两原则：一为客观重要性原则，即任何人的生命一旦开始便应当是成功的而非失败的，生命的潜力应当被实现而不应当被浪费，这对每个人的生命在客观上都同

〔2〕 参见〔德〕瓦尔特·施瓦德勒：《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的文化》，贺念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版导言第3-5页、第149、159页。

〔3〕 参见朱振：《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

〔4〕 参见郑戈：《迈向生命宪制——法律如何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的风险》，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

〔5〕 参见陆俏颖：《人类基因编辑与基因本质主义——以CRISPR技术在人类胚胎中的应用为例》，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7期。

〔6〕 参见李建军、王添：《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引发的伦理关注和规制策略》，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11期。

〔7〕 参见姚大志：《基因干预：从道德哲学的观点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

样重要。所谓的“客观”重要性是强调，一个人生命的成功不仅对他自己或他身边的人重要，而且人们都有理由关心其他人的生命，并希望他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二为自主决定原则，即在承认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客观重要性的基础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具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根据这种具有内在美德的特殊责任，个人有权作出关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的基本决定。^{〔8〕}

这两个原则作为伦理命令具有实际效力，均体现出了尊严观的自由向度。第一条原则强调自尊（self-respect），即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承认自己的生活应当是一次成功的表现，而非一次机会的浪费。这里的“自尊”是承认性尊重（recognition respect），是基于人之地位的承认而必须表现出的尊重，体现为生命同等重要的尊严观，是对内在于事物本身超然价值（detached values）自身的尊重，不同于评价性尊重（appraisal respect），并非根据某个人的品质或成就表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存在于特定主体利益之中、涉及效用和公正的派生价值（derivative values）不同。^{〔9〕}第二条原则强调本真性（authenticity），即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个人责任，确定在自己的生活中什么算是成功，以及通过自己认同的前后一贯的叙述创造这种生活的个人责任。^{〔10〕}自尊和本真性构成自由尊严观的双重向度：自我尊重是尊严的首要方面，每个“自我”均具有承认自身具备尊严的自由，且这种自由具有本真性指向的伦理独立性，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试图作出确立尊严的决定时，这种决定应当由本人自主作出。

自由尊严观为人体基因科技辩护：人体基因科技利于提升自尊，它并不涉及具体人群的利益，而是关系到了以何种方式产生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基于伦理道德反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理由不能为终止相关研究提供恰当理由。^{〔11〕}人体基因科技的研究会带来诸多医学收益，会使人类后代的生命更长久、更富有才华，并因此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改善我们人类物种，在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加入我们有意识的设计，那么，客观重要性原则会认同这种努力，并且，根据自主决定原则，在缺乏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危险时，禁止阻碍那些自愿引领改善人类物种的事业、为此付出努力的科学家和医生。^{〔12〕}据此可知，自由尊严观对人体基因科技秉持的价值是：人体基因科技发展符合自由尊严观的自尊原则和本真性原则，公众以道德和伦理信念为根据反对人体基因科技会阻碍科学进步和人类发展。

（二）自由尊严观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

在自由尊严观之下，由于每个拥有生命的人都有权作出关于什么是成功生活的基本决定，因此，政府应当让人们自由地为自己作出关于生活成功标准的决定。^{〔13〕}本真性原则所具有的伦理独立性具有明确的自由指向，其伦理意义在于，国家的刑法或者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所施加的或者潜在的强制，在保护“好好生活”所要求的个人尊严方面起到作用，但是，珍惜自己尊严的人

〔8〕 See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48-449.

〔9〕 参见前引〔8〕，Ronald Dworkin书，第428页。

〔10〕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许宗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7页。

〔11〕 参见前引〔8〕，Ronald Dworkin书，第447页。

〔12〕 参见前引〔8〕，Ronald Dworkin书，第451-452页。

〔13〕 参见前引〔8〕，Ronald Dworkin书，第449页。

必须拒绝基于对社会和政治制裁的恐惧而塑造自己的伦理价值观。^[14] 与之相应的国家预防立场则体现为弱式风险预防。弱式风险预防指公权力机关不得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拒绝采取风险应对措施，其为公权力机关拒绝采取行动排除了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这一理由，^[15] 在实质上仅提出了一个反对采取预防措施的可能理由。^[16]

弱式风险预防的本身蕴含自由尊严观，秉持着自由的价值立场，其坚持法律保障每个人在主观和客观的各个层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状态，^[17] 这种发展导向每个人所追求的具有客观重要性的成功。自由尊严观推导出来的国家预防立场也有所特指：自尊原则为派生价值提供了理由，主张应当以取得“成本—收益的效用”为根据展开国家预防行为，本真性原则要求伦理独立性，旨在解决超然价值问题，只有个人才能够决定什么是以及如何达至成功的人生，而不应当受到国家行为的威慑而被迫进行伦理选择。基于此，国家对于人体基因科技的干预是极为有限的，在缺乏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危险的情况下，禁止对科学家和医生所从事的人体基因科技活动进行干预。基于这种自由尊严观的立场，德沃金主张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解决派生价值的问题，同时强调风险的科学确定性，这指向了国家对人体基因科技的弱式风险预防。

从风险预防的尊严内置论看，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的内在关联在于：第一，从衡量方法看，弱式风险预防排除了缺乏确定性的损害证据作为拒绝监管的理由，通常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风险决策进行考虑。^[18] 自由尊严观基于派生价值同样对人体基因科技作出评价，要求衡量一部分群体的收益和另一部分群体的损失，以及成本和效益存在的公平性问题。^[19] 二者均遵循本益衡量的方法论。第二，从证明机制上看，弱式风险预防强调国家不得以缺乏风险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拒绝采取风险预防行动；自由尊严观主张，只有存在明确证据足以证明危险的存在，才可以对科学家和医生的行为予以限制。且客观重要性原则强调，国家应基于超然价值对人体基因科技进行评价，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20] 可见，二者均为国家采取预防措施提供正当性或合法基础，虽然并未涉及采取何种干预手段，对预防手段类型的证明要求较低，但是对采取预防措施提出了“危险存在”的证明要求。

（三）自由尊严观与弱式风险预防的弊端

自由尊严观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尽管自由是人拥有尊严的最终秘密，是最直接明了的、不可再还原的规范性道德起点，^[21] 也是任何主体不可或缺的利益和法律必须保障的价值，

[14] 参见前引 [10]，罗纳德·德沃金书，第 234 页。

[15] See Cass R. Sunstein,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5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13 (2003).

[16] See Julian J. Koplin, Christopher Gyngell, Julian Savulescu, Germline Gene Editing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4 *Bioethics*, 51 (2019).

[17] 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3 页。

[18] 参见前引 [15]，Cass R. Sunstein 文，第 1007 页。

[19] 参见前引 [8]，Ronald Dworkin 书，第 428 页。

[20] 参见前引 [8]，Ronald Dworkin 书，第 429 页。

[21] 参见前引 [2]，瓦尔特·施瓦德勒书，译者导言第 22 页。

但是, 纯粹的实践理性和理性法则的反思会将我们带入一个无条件的价值理念, 自由并非毫无限度, 特定主体无限度的自由必然会影响其他主体的自由。自由尊严观在客观重要性方面强调的“成功标准”会威胁本真性原则下的自主决定, 使“自主”背离其本质而成为“他主”, 由此产生了自由尊严观反而会危害自由的逻辑悖论。

自由尊严观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同样存在理论弊端。弱式风险预防被视为微不足道, 如果预防原则仅声称完全的确定性不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先决条件, 那么, 它实质上没有明确的预防指向, 因为这是每一个理性决策制定者都已然接受的。^{〔22〕} 桑斯坦认为, 预防是规制风险的一种粗糙的、有时是反常的方式, 可以通过其他更好的途径实现这些目标, 弱式风险预防原则是没有用处的, 它“不会把人引入任何方向”, 只会因为可识别的认知机制而给人一种(虚假的)可行的假象, 这种认知机制导致人们的视野狭窄。^{〔23〕} 其他学者同样认为, 弱式风险预防“弱得无益”, 难以为决策提供任何方向上的指导, 表现得微不足道, 其只是拒绝了决策者在采取预防措施之前完全确定威胁存在的要求, 事实上, 它没有规定任何具体方法来衡量现代科技可能的成本和效益, 其适用范围非常狭窄。^{〔24〕}

自由尊严观及其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不仅存在理论弊端, 在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实践中同样会产生危害。如果国家秉持自由尊严观并遵循弱式风险预防, 则会导致国家对于任何存在危害预期的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均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 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无法对公民的科研自由、行为自由进行事前干预, 国家对具有自由属性的公民行动进行限制会被视为违反过度禁止原则的公权力肆意。国家预防行为在立法上缺乏基于风险理由限制私主体自由的明确法律规范, 由此导致缺乏对科技风险进行事前预防的风险行政机制, 国家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人体基因科技风险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 无法及时精准定位科技风险并采取积极的风险规制措施。其实践危害为, 一旦国家对自由保障的程度过重, 则会影响与自由价值相对应的秩序价值的实现, 也会反过来危害自由本身。国家预防科技风险时的公权力行使因保障公民自由而止步不前, 则无法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维持, 缺乏必要限度的自由尊严观和弱式风险预防会导致无序状态。此外, 自由尊严观支持自由主义优生学, 对于任何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研究与应用均缺乏必要限制, 其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难以发挥规制风险的理论效用。

三、秩序尊严观与强式风险预防

相较于自由尊严观, 面对人体基因科技存在更为保守的人性尊严观, 这种尊严观蕴含着秩序的价值内核, 诉诸秩序的内在价值, 存在着对确定性、可预见性的价值诉求, 因此被称为秩序尊严观。

〔22〕 See Daniel Steel, *Philosophy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Science, Evid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7.

〔23〕 参见前引〔15〕, Cass R. Sunstein 文, 第 1008-1011 页。

〔24〕 参见前引〔16〕, Julian J. Koplin、Christopher Gyngell、Julian Savulescu 文, 第 51-52 页。

（一）秩序尊严观的三种形态

1. 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

欧盟对人体基因科技秉持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1997年欧盟《〈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关于禁止克隆人类的附加议定书草案》规定：克隆使人类选择性繁殖成为可能，将人类视为储存零件的仓库，使人类工具化，把人从主体变成客体，违背了人本身的目的性存在，故侵犯了人的尊严。^{〔25〕}1998年《欧盟议会关于克隆人的决议》要求成员国颁布立法，对克隆人实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令。^{〔26〕}相较于克隆技术，欧盟对人体基因科技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但依然强调人作为目的的绝对地位。1997年欧盟《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规定：“必须认识到确保人类尊严的重要性和滥用生物科技可能危害人的尊严的行为”，“修改人类基因的干预只能用于防治疾病目的，且不得对后代的基因进行任何修改。”^{〔27〕}尽管如此，由于改造胚胎被视为对人的亵渎，胚胎与人类一样，具有全部的道德地位，^{〔28〕}治疗型的人体基因科技同样备受诟病。

欧盟坚持康德的主客二分论的尊严内涵，人与物的绝对分裂思想一直充当着限定人性尊严的原理：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有价格的东西可被其他等价物取代，与此相反，超越一切价格、不容许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29〕}而欧盟的尊严立场恰恰在于，人作为目的性存在，不能够被当成客体地位的工具，胚胎同样具有完全的道德地位。这种对目的与手段进行严格区分的价值秩序观，与自由尊严观忽略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迥异。

2. 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

桑德尔主张的尊严观以自然为核心，体现为自然秩序主导的尊严观，其坚持人体基因科技应用以自然为限度。基因改良最深层次的道德疑虑在于，“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但伦理上的自主、平等及技术上的不安全均不足以成为禁止该技术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自然的道德地位，^{〔30〕}即自然存在的生命是自然的馈赠，这种馈赠与生俱来，不能被其他生命操控^{〔31〕}。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并不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如救死扶伤），而反对超越自然界限的滥用（如基因增强制造“比好更好”的完美），其中的“度”即是自然的状态。^{〔32〕}一个以往由自然命运决定的领域不应当成为可以进行人为选择的竞技场。^{〔33〕}

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认为，“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

〔25〕 See Draft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on the Prohibition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1997).

〔26〕 See Resolution on Human Cloning, European Parliament (1998).

〔27〕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1997).

〔28〕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29〕 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30〕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6页。

〔31〕 参见前引〔30〕，迈克尔·桑德尔书，第119页。

〔32〕 参见前引〔30〕，迈克尔·桑德尔书，导论第X、XIII页。

〔33〕 参见前引〔30〕，迈克尔·桑德尔书，第86页。

类的欲求而‘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 (the nature as it is), 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 (what it is not)”, “对此应设定限制规则, 包含具体的、适合人类生命初始之谜的道德约束”^[34]。此种秩序尊严观强调尊重自然之道、自然的偶然创造, 人类的改造行为应与自然秩序相吻合, 而自然秩序下的伦理观与物种的自然属性相关联, 且这种自然属性被其置于规范金字塔的顶端, 比“自主权”“公正”和“个人权力”更重要。^[35] 在此观念之下, 人体基因科技应用以自然为限度, 低于生命自然标准的疾病被视为可以运用人体基因科技治疗, 但禁止超越生命自然限度地打造完美状态。

3. 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

哈贝马斯主张的尊严观以人性为中心, 坚持尊严的人性秩序内核, 属于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他认为, “人的尊严”是在严格的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对称关系, 表明了一种“不可侵犯性”^[36], 其核心指向了人的内在本质, 即人性。然而, 至今仍然缺乏对人性的明确界定。^[37] 根据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 物种遗传的优化不能够被看作是增加了个体自主性, 相反, 它会破坏独立生活、彼此尊重的人性规范。^[38] 如果把人的生物基础理解为不可丢弃的人性, 那么, 保护基因遗传的完整性则被视为正当的。而干预人体基因则意味着, 生命体在诞生前受到了支配, “设计生命”的干预行为侵犯了人的存在方式; 设计者以不可撤销的方式改变生命的初始条件, 从内部侵入了另一个人的自主意识, 成为他人生活的共同创造者 (co-author)。^[39]

这实际上强调, 只有基于偶然事实自然出生的人才能确保其在道德意义上的自主性, 经过基因设计生命体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与设计者的从属、控制关系。^[40] 生命的偶发性决定了人类生命道德形态,^[41] 人性要求出生的偶然性和个人作为生命中的“唯一作者”, “设计生命”的干预行为打破了生命的偶然性和自主性, 被视为对人性的侵犯。对人生命体的根本改造使“自然人”“自然生命”沦为“技术人”“人工生命”, 彻底改变人的本性与结构, 从根本上颠覆了作为道德起点的人性基础。^[42] 故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要求, 在人类的生命发展史上要维护以人性为基础的秩序尊严观, 排除对基因进行的人为干预。

(二) 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

秩序尊严观强调人的尊严不能违逆人作为绝对目的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和人性的秩序, 秩序尊严观论者相较于自由尊严观论者而言, 对人体基因科技持有更保守的态度, 其风险偏好更低, 且往往将国家视为维护秩序的积极行动者, 秉持强式风险预防的规制立场。强式风险预防指, 当存在严重威胁他人 (包括后代) 健康或破坏环境的风险时, 即使这种风险存在科学不确定性, 也

[34] 前引 [30], 迈克尔·桑德尔书, 第 119 页。

[35] 参见前引 [2], 瓦尔特·施瓦德勒书, 第 79 页。

[36]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2003, pp. 27-29.

[37] 参见前引 [28], 弗朗西斯·福山书, 第 129 页。

[38] 参见前引 [36], Jürgen Habermas 书, 第 30-33 页。

[39] 参见前引 [36], Jürgen Habermas 书, 第 53、81 页。

[40] 参见朱振:《反对完美?——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道德与法律哲学思考》, 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41] 参见前引 [36], Jürgen Habermas 书, 第 75 页。

[42] 参见樊浩:《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应当作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的决策，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损害不会发生。^{〔43〕}强式的积极预防强调必须采取广泛的预防行动，以完全消除对人类福祉的任何潜在威胁，而不考虑预防行动的成本、威胁可能发生的程度以及威胁造成的危害程度。^{〔44〕}强式风险预防的意涵在于，即使存在着风险不确定性，依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同时并未对举证责任进行限定，国家采取积极预防措施不以能够证明确定损害为前提，也不受制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甚至在面对事关重大的风险的情况下被视为一种不计代价的国家预防行为。^{〔45〕}秩序尊严观相较于自由尊严观更追求稳定和可预期性，这种价值偏好影响了风险预防强度。

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严禁不以诊断或治疗疾病为目的干预人类基因的行为，且主张对任何修改后代基因的行为均予以禁止。^{〔46〕}该尊严观诉诸禁止性命令进行预防。主客二分论蕴含着强式积极预防中的禁止性预防方式，即通过禁止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活动来预防风险，除非该活动的支持者表明该活动不存在损害危险。^{〔47〕}禁止性预防是强式风险预防中力度最强硬的规制手段，从根源上杜绝了行为引起风险的任何可能性，因此，禁止性预防也是效果最明显的风险规避方式。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通过禁止的方式排除克隆技术和非治疗型人体基因科技带来的风险，涵括强式风险预防的禁止性预防手段。

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主张以恢复自然状态为限度对人体基因科技进行合理利用。这种秩序尊严观区别于自由尊严观支持的自由主义优生学（市场化的逻辑），而主张对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设置自然状态的限度，即对增强型的人体基因科技予以禁止，同时对于人体干细胞的研究设定限制规则，由此保持尊严内涵的自然道德地位。^{〔48〕}自然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对特定增强型的基因科技同样采取禁止措施，且阐明人体基因科技的限度立场，这实际上与强式风险预防的积极作为禁令方式一脉相承，主张对相关科学研究设置限制规则，且并不要求国家对采取积极预防措施进行举证。

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要求对与生命体相关科技活动采取谨慎、适度的措施，通过道德共同体所创造的法律，用权利和义务对相关事项予以规范。^{〔49〕}可见，该秩序尊严观并非通过禁止这种效力最强的措施进行绝对限制，而是通过立法规制相关科技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对风险预防的态度并非像其他秩序尊严观一样诉诸最强意义的禁止性风险预防，而是通过法律配置权利义务的方式要求道德共同体制定法律。而所立之法需要尊重以偶然事实为基础、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自主性的人性，确保个人作为自己生命“唯一作者”。这种主张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的积极作为方式应对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观点契合强式风险预防所要求的国家积极作为面向，且这种积极预防措施相较于禁止而言更具开放性，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提供

〔43〕 参见前引〔15〕，Cass R. Sunstein 文，第 1013 页。

〔44〕 参见前引〔16〕，Julian J. Koplin、Christopher Gyngell、Julian Savulescu 文，第 51 页。

〔45〕 参见前引〔15〕，Cass R. Sunstein 文，第 1013、1017-1018 页。

〔46〕 参见前引〔27〕。

〔47〕 参见前引〔1〕，Richard B. Stewart 文，第 76 页。

〔48〕 参见前引〔30〕，迈克尔·桑德尔书，第 119 页。

〔49〕 参见前引〔36〕，Jürgen Habermas 书，第 33 页。

多样化的风险预防空间。

（三）秩序尊严观与强式风险预防的弊端

秩序尊严观存在内涵空洞的理论弊端，且对自由价值构成排他性限制。尽管康德将自由视为原初规范的道德起点，但他却用尊严主体目的论对人性尊严进行了绝对的主客二分。主客二分论的秩序尊严观即是康德诉诸主体性的人性尊严观予以落实的体现。虽然主客二分论观点鲜明，但却论证无力，以空洞的价值观回避对真正问题的论证，即主客二分论既未界定“尊严”或“尊重”的明确内涵，也未阐明尊严的理论基础，仅将尊严当作一个不可再简化的绝对价值，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受到了多个人权公约和保护人性尊严基本原则的影响，实际上遵循了价值观至上的立场。^{〔50〕}自然中心论和人性中心论的秩序尊严观都注重机遇（chance）的偶发性，二者能够为国家对不同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采取不同预防手段提供理由，但并未彻底解决胚胎的道德地位，并未阐明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51〕}与此同时，秩序尊严观将主体目的、人性、自然的价值秩序予以最大化保留，具有限制自由的倾向。

强式风险预防的理论弊端在于欠缺理性。强式风险预防断言，任何具有不可忽略的损害风险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通常会以禁止命令方式进行风险预防，而此类禁令措施本身会带来不利后果。^{〔52〕}强式风险预防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供指导，而是禁止了所有的行动，包括不作为。由于风险存在于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而管制行为也会因产生替代风险而违反预防原则。这意味着，任何普遍预防的努力都将使运转瘫痪，政府在风险广泛存在且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将在事实上赋予政府和决定权以及采取监管行动的广泛事由，为政府过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提供正当理由。^{〔53〕}此外，强式风险预防的非理性表现为不计成本地进行预防。预防的成本高昂不仅是消除了“机会利益”或增加了替代风险，而且会造成巨大损失，使得预防措施难以实施。由于预防措施的成本支出本身就带有风险，故不应当对任何可能致害的风险都花费大量资金来进行预防。^{〔54〕}

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不仅存在理论弊端，也会产生实践危害。国家权力秉持秩序尊严观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行使遵循着绝对主体性、自然与人性的抽象秩序价值，这些价值决定了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立场遵循如下逻辑：除非有证据表明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造成的损害不会发生，否则国家机关应当积极采取行动预防该科技风险。此时国家机关基于保障秩序尊严观下的抽象公共利益，不再以私主体的自由作为行使公权力的界限。这便为国家公权力介入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且介入程度并不存在明显的限度，国家预防行为在缺乏明确限度的情况下会过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此外，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主要诉诸禁止的手段，导致了秩序的维持将以牺牲公民普遍的行动自由为代价，对科技风险的过度规制会阻碍科技发展，

〔50〕 参见前引〔40〕，朱振文。

〔51〕 See John Finnis, *Intention and Identity* (Collected Essays: Volume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7 - 301.

〔52〕 参见前引〔22〕，Daniel Steel文，第17页。

〔53〕 参见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54〕 参见前引〔15〕，Cass R. Sunstein文，第1020-1028页。

进而影响人体基因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

四、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选择

当前关于生物科技的论辩已经极化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为坚持自由至上者，其主张不应为新技术发展施加限制，要求去除管制的自由市场，且能够从被松绑的技术进步中获利；另一大阵营为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包括宗教信徒和新技术的反对者、担忧优生学卷土重来的人士。这两种极化状态下的观点，不论是主张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完全放任自流抑或进行大范围禁止，都具有误导性。^{〔55〕} 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反映了这两大阵营的价值取向。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所对应的风险偏好和风险预防强度不同，只有承认尊严观与情感或知觉紧密相连，才能真正连接“实然”与“应然”，^{〔56〕} 才能在特定的尊严观指导下明确国家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立场和强度。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秉持何种尊严观应对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可以根据既有尊严观建构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

（一）正义尊严观的证成

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具有逻辑悖论、过于绝对、内涵空洞、论证疏漏等特点，不仅存在理论弊端，而且会导致实践危害，不足以成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基础。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遵循需要吸收上述不同尊严观的合理内核。

由于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客观重要性，因此，应当将每个公民的生命视为具有平等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尊重具有正当性，而不论其遗传特征如何，都不能因个人的遗传特征使人的尊严受到贬低，应当同样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57〕} 客观重要性能够推导出平等价值。其中，尊严之平等从消极层面而言是指，所有个体的人格都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一种不可剥夺且须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从积极层面而言是指，每个单独的个体基于道德法则所体现出来的德性并不相同，从而配享的尊严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指法权，后者指德性。^{〔58〕} 基于此，客观重要性原则中的平等应作为重构的尊严观的内核之一。

从整体的自由尊严观看，其提供的重要价值内核为自由。一方面，客观重要性原则要求每个生命都应遵循成功标准，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技术福利，这种福利作用于通过基因治疗提升生命质量。这种福利也提升了尊严，是实现客观重要性的手段。而该技术发展在价值层面取决于科研自由，因此，自由及其实践指向的福利应作为重要因素被提取。且基于平等的福利表达为共同福利。另一方面，本真性原则强调的自主决定从生命个体层面体现了尊严内涵。自由尊严观通过本真性建构尊严的内涵，由此最大程度地排斥公权力主体对个人自主决定的领域进行干预。若放任客观重要性之下的自由，则会对生命自主决定产生影响，从而减损生命个体的

〔55〕 参见前引〔28〕，弗朗西斯·福山书，第182-183页。

〔56〕 参见前引〔28〕，弗朗西斯·福山书，第117页。

〔57〕 Se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 (1998).

〔58〕 参见前引〔2〕，瓦尔特·施瓦德勒书，译者导言第19页。

人性尊严。因此,自由不能成为没有边界的价值遵循,应当为自由尊严观之下的自由价值划定界限。

秩序尊严观不失为限定自由价值的有效手段。将人作为目的、坚守人性和自然无疑为限定自由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目的、人性和自然本身过于绝对和抽象,甚至这种秩序尊严观仅为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所持有。尽管未受到人体基因科技干预的生命状态符合人性、自然和人是目的的抽象秩序观念,但是对于被疾病所困扰的生命体而言,尊严的价值极为有限。因此,从秩序尊严观中提取的价值要素不仅构成自由的限度,也要弥补秩序价值观念本身的缺陷。从秩序尊严观的内涵构成看,秩序存在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两方面的诉求,其中,安全性是可预见性诉求的目的,可预见性是安全性诉求的手段。^[59]此种安全观能够弥补秩序尊严观仅关注价值秩序的抽象缺陷,安全价值要求对技术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安全是人体基因科技得以应用的前提,也是科技应用的标尺,超越安全限度被视为违反人性和自然,由此克服秩序尊严观过于绝对的缺陷。与此同时,安全是风险预防的目的,风险预防受到国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指引。^[60]鉴于上述理由,安全应当作为风险预防尊严内置论的核心价值之一。

上述论证初步证成了重构的尊严观应当包含四个维度,即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任何一个维度都并非绝对的,而需要以其他价值作为限度。在法学领域,与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产生直接价值关联的乃是正义,法律被视为正义的综合体。^[61]在伦理学领域,正义被视为“应然之理”,包含“自然之理”和“人性之理”。^[62]因此,蕴含着多重维度的尊严观可被概括为正义尊严观。

(二) 正义尊严观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

与自由尊严观和秩序尊严观均不相同,正义尊严观指向了包含价值界限的四重价值维度,其所涵括的风险预防强度也不同于前两种尊严观所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和强式风险预防。学界通过吸收二者的合理性对风险预防原则予以发展和改造,提出了充分风险预防作为对强式和弱式风险预防的弥补。充分风险预防涵括于正义尊严观,并可以通过正义尊严观在既有充分预防原则版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内涵填充,进而将其作为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

充分预防原则(sufficientarian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SPP)建议对实现或维持“足够水平”福祉的威胁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就像其他版本的预防原则一样,面临特定类型的风险时,充分风险预防要求偏离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这被视为积极预防的决定性特征。就人体基因科技而言,如果健康安全具有内在价值,则不应仅根据最高预期效用作出可能影响公共健康的决策,还应当避免对健康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这种权重安全性的目的是降低可能远远大于潜在效益的损失风险。充分风险预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安全的重要性,它特别重视避免可能导致个体降

[59] 参见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60] 参见王贵松:《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

[61] 参见〔美〕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339页。

[62] 参见李德顺:《中西“正义”理念之异同》,载《北京日报》2020年6月29日,第010版。

至某种极端福利水平以下的威胁。^{〔63〕}

正义尊严观中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共同福利与充分风险预防的内在关联体现为：充分风险预防关注的健康安全观与正义尊严观的安全面向具有内在一致性，旨在对威胁人生命健康的技术风险进行预防。同时，这种安全阈值并不以最高预期为标准，而强调需要考虑在整体福利水平以下的特定个体的健康安全。这便是对原本处于健康弱势状态的个体的重视，在充分水平的限度内给予这些个体以足够尊重，体现了正义尊严观的平等价值。此外，充分风险预防能够矫正自由尊严观：自由价值仅为人体基因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由，这些研究旨在保持基因健康，增强人类物种的长期生存能力，却忽略了风险存在，过度促进健康而超过充分的程度。充分预防原则对风险有更充分的关注，力图避免换取短期利益的情形，将后代面临不平衡的长期损害风险降至最低。^{〔64〕}充分风险预防对弱式风险预防的无力和强式风险预防的严苛进行了弥补，同时吸收这两种风险预防的合理性。通常而言，尽管弱式风险预防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实用，但其对人体基因科技政策的辩论几乎没有作用；强式风险预防更为相关，存在采取积极行为进行风险预防的指向，充分风险预防吸收了其积极指向，特别重视避免在认知上被低估、理解不足的威胁、对实现充分福利水平的威胁以及对健康安全的威胁。虽然很难从多个版本的必要预防措施中获得任何直接的政策建议，但充分风险预防体现的正义尊严观仍具有合理性。^{〔65〕}这便是充分风险预防在不忽略风险的同时，意识到人体基因科技创造共同福利的一面，这同时也是对自由的尊重，且是通过吸收弱式风险预防将自由限定在平等和安全的限度内。

（三）充分风险预防的优势

首先，充分风险预防能够为风险预防提供相对明确的方向指引，增强可行性。通常而言，在具体应用场景之下，风险预防原则包含两个要素：第一，风险损害后果的严重性，该原则适用于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第二，即使没有“完整的”科学证据，存在科学争论或知识分歧，政府也应该采取行动。^{〔66〕}在人体基因科技领域，充分风险预防旨在预防生命健康、人的主体地位、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潜在威胁，风险预防的指向性被该领域的风险特征和风险类型所限定。存在科学争议、知识分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取决于正义尊严观的四重指向，这弥补了弱式风险预防“不会把人引入任何方向”的缺陷。

其次，充分风险预防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强式风险预防可能导致的国家公权力过度行使，进而防止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强式风险预防缺乏明确法律定位和法定约束力，同时也没有必要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其规制措施予以审查，由此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威胁。充分风险预防则意味着，科技领域的国家预防措施行使不再是完全由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事

〔63〕 参见前引〔16〕，Julian J. Koplin、Christopher Gyngell、Julian Savulescu 文，第 57 页。

〔64〕 参见前引〔16〕，Julian J. Koplin、Christopher Gyngell、Julian Savulescu 文，第 58 页。

〔65〕 参见前引〔16〕，Julian J. Koplin、Christopher Gyngell、Julian Savulescu 文，第 59 页。

〔66〕 See René von Schomber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its Normative Challenges*, in Elizabeth Fisher, Judith Jones, René von Schomberg ed., *Implemen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Edward Elgar, 2006, p. 23.

项。充分风险预防促使国家风险预防成为一项遵循正义尊严观的法定义务。正义尊严观之下的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对国家风险预防的条件、程序和内容存在特定要求和法定限度。正义尊严观为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提供制度性保障的价值指引,避免国家机关的强式风险预防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再次,充分风险预防能够通过充分性限度防止预防成本过高,并克服成本效益分析的价值困境。风险预防的适当应用必须通过预防程度予以确定,而预防程度恰恰是风险预防的难点:预防程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预防科技风险的正当性与实效性,若预防程度过高则会加大预防成本,导致收效甚微、抑制技术发展;若预防程度过低则无法起到预防效果、威胁秩序。充分风险预防遵循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充分性限度。一方面,在援引预防原则、确定特定领域和时间段内的预防程度时,一致性、非歧视和比例性构成预防程度的充分性限定,^[67]由此确保风险预防的成本达到合理水平,风险预防措施受到成本效益分析的约束。另一方面,充分风险预防并不完全受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限制,其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方面仍然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遵循正义尊严观的伦理限度,不完全以成本效益作为行使预防措施的标准。

最后,充分风险预防尊严内置论的价值平衡有助于实现利益平衡。正义尊严观克服了价值绝对化倾向,其蕴含的平等、自由、安全和共同福利四重价值互为界限,进行风险预防决策时根据特定价值的重要性或分量这种类似于原则的方式予以权衡。^[68]正义尊严观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也会采取重要性权衡的方式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科技创新利益与科技风险,以确保科研自由、自主决定、技术福利维持在充分水平。

五、结论:正义尊严观的风险预防指引

本文在尊严内置论的视角下立足于解决人体基因科技风险预防的价值依据和预防立场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本文研究表明,自由尊严观涵括的弱式风险预防与秩序尊严观涵括的强式风险预防均存在理论弊端和实践困境,正义尊严观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能够为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提供价值依据。

在正义尊严观之下,自由表达为,每个个体具有自主性、具备自由发展的能力,如果在生命体发展的最初阶段运用基因技术手段使生命体受到过度干预,则违背了自主决定。平等的约束力体现为,对突破自然力和生命规律的生命个体进行基因增强,会造成生命体之间悬殊且难以通过后天弥补的差距,国家对人体基因科技应用范围的干预应当避免造成基因改造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极化差异。安全则要求,个体的生命、健康免除技术威胁,人体基因科技应当满足安全标准。共同福利意味着,国家并不禁止全部类型的人体基因科技,其所带来的共同福利对于弥补在自然状态下存在严重缺陷的特定生命体具有不可或缺的矫正作用。综上,正义尊严观派生出了遵循必要

[67] 参见前引[66], René von Schomberg 文,第24页。

[68]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孙健智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74页。

限度的人体基因科技应用，在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对任何一个尚未达到普遍健康水平的生命状态予以矫正，这构成了在人体基因科技领域充分风险预防的内涵。充分风险预防遵循正义尊严观的指引，在价值、利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划定充分性限度。需要说明的是，充分风险预防作为决策工具尚须厘清其实质权重和临界值，对充分风险预防进行大量的细化和澄清后，才能将其用于具体决策。^{〔69〕} 总之，正义尊严观及其涵括的充分风险预防为预防人体基因科技风险的制度性建构提供了相对明确的价值指引和预防限度，充分风险预防在规则层面的建构有待于法学、哲学和伦理学学者共同探讨。

Abstract: The prevention position of human genetic technology risk depends on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The freedom dignity view adheres to the theory of dignity autonomy, emphasizes self-respect and the independent decis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posi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 is weak risk prevention. The order dignity view contains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nature-centrism and humanity-centrism,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posi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 is strong risk prevention. The freedom dignity view and the order dignity view have theoretical drawbacks such as omissions in argumentation and hollow connotations. The corresponding weak risk prevention is ambiguous and the strong risk prevention lacks rationality, both of which will produce practical harm when exercising the state public power to prevent human genetic technological risk. The value of preventing human genetic technological risk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the justice dignity view including equality, freedom, security and common welfare. The risk prevention position contained in the justice dignity view is sufficientarian risk prevention, which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 prevention positions.

Key Words: human genetic techn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freedom dignity view, the order dignity view, the justice dignity view, sufficientarian risk prevention

(责任编辑：赵 真 赵建蕊)

〔69〕 See G. Owen Schaefer, What is the Sufficientarian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3 *Bioethics*, 1083 (2019).